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耶鲁大学:不再改变世界,回归学术本质

■郭英剑

2025年春,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莫里·麦金尼斯委托成立了一个10人规模的教职员委员会。该委员会历时一年完成了一份《高等教育信任委员会报告》。今年4月15日,该报告正式由耶鲁大学校长办公室发布,全文约58页,包含详细策略与20项具体建议。

它标志着耶鲁大学乃至美国精英高等教育界开启了一次罕见的公开自我反思与改革倡议。这份报告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它来自耶鲁这样的世界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更因为它直面当下美国高等教育最核心的问题——公众为何不再信任大学?大学又该如何通过使命回归与制度改革,重新赢得公众信任?

美国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机

过去10年,美国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度急剧下降。根据报告引用的民调数据,10年前,约57%的美国人将高等教育“非常”或“相当”有信心;到2024年,该比例降至36%这一历史低点。尽管2025年略有回升,但仍有70%的美国人认为“高等教育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这一信任危机并非孤立现象。20世纪中后期以来,美国人对媒体、政府、企业等主要机构的信任度普遍下滑,高等教育信任度的下降速度尤为显著。尤其是精英私立大学,因高昂费用、录取争议和校园文化问题而承受着更大压力;相比之下,社区学院等公共学校反而更被信任。

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的期待原本集中在几个很清晰的的目标上,如提供公平机会、保障教育可负担性、培养有能力服务社会的人才、维护知识与真理的公共价值。但现实中,学费持续上涨、录取不透明、意识形态之争不断等因素使大学与公众间形成了巨大的信任鸿沟。

作为全球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耶鲁大学因其象征性而受到放大审视。比如报告指出,高等教育被赋予了太多相互冲突的期望:既要“选择性”又要“有包容性”;既要“上得起”又要“保持高品质甚至奢华体验”;既要“坚持精英主义”又要“追求公平正义”。这种“分散的目的”令公众困惑不解,也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

为弄清危机来源,该委员会开展了广泛的工作,包括举办校园活动、采访批评者与支持者、与社区成员展开对话、审阅公众评论,并编制了超过300个来源的参考书目。报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信任危机“真实、紧迫,且必须加以解决”。它既有外部因素,包括社会极化、经济压力、疫情后人们对教育价值的重新评估,以及政府对大学的审查;也有内部因素,包括自我审查、行政膨胀、学术使命偏移等。报告特别强调,大学不能只把问题归咎于外部环境,而必须主动承担责任。

承认责任,重申大学核心使命

麦金尼斯在4月15日的公开信中表示,她全面接受报告,并将其视为恢复信任的路线图。她将大学描述为“一个伟大的实验场”,强调好奇心驱动的知识追求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同时承认大学并不完美,必须接受公众问责。

麦金尼斯表示,信任度下降并非凭空出现,耶鲁并非旁观者,必须承认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

在我看来,这句话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一套危机公关话术,而是一种制度性的自我反省。对于精英大学而言,真正的改革不是解释自己为何被误解,而是承认自己失去了部分公众信任。

在此基础上,麦金尼斯承诺将以“谦逊与好奇心”面对批评。她重申,耶鲁必须保护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并引用1974年发布的《耶鲁大学言论自由委员会报告》中的一句话,强调耶鲁必须是一个“敢于承担诸如不同意他人以

大学一旦试图“对所有人都无所不能”,公众就难以对其进行评价。大学的使命越泛化,承诺越宏大,问责反而越困难,信任也就越容易流失。



及被他人不同意的风险”的地方。

这种重申并非抽象的姿态。麦金尼斯已成立新教职员委员会,制定学术自由原则,并认同报告关于重申耶鲁核心使命的建议。她强调大学必须清楚表达其学术目的,而不能在过多社会期待中迷失方向。

在可负担性方面,她宣布家庭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的学生将免学费,并承诺提高财务援助透明度,改革本科录取公平性,强化学术严谨性。她也接受报告关于“大数据源获取渠道、促进智力多元、应对课堂分神等方面的建议。麦金尼斯强调,“信任必须要靠努力才能赢得”。她承诺全校将全力推进改革,并倾听全国声音。

由此可见,在耶鲁的自我理解中,这份报告并非一份普通的校内文件,而是指导大学度过“不确定时期”的蓝图。

从成本、录取到课堂与治理

该报告包括引言、历史语境、问题诊断及20项推荐建议。其核心论点是,大学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保存、创造和分享知识”。信任建立在履行承诺之上,而近年来高校“分散的目的”使公众和内部成员难以判断大学是否真正履行了核心职能。

因此,报告并非只列出问题,而是将这些问题统一放在在大学使命偏移的框架中加以理解。换言之,成本、录取、言论自由、课堂质量、行政治理等表面看似不同的议题,但在核心层面却都与一个问题有关,即大学是否还在围绕其核心使命运行。

首先是成本与价值感知。报告用大量篇幅分析高等教育费用持续飙升现象,指出过去40年来,美国大学学费涨幅远超通胀和家庭收入增长,导致普通中产阶级家庭背负沉重的债务。因此,公众普遍质疑“大学是否仍然值得读”。尤其在精英私立大学,这种质疑转化为一种强烈不满:人们付出了高昂学费,却换不来高品质高等教育。报告指出,耶鲁等机构虽然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务援助,但沟通不透明导致许多潜在的申请者望而却步。同时,学位回报感知下降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对某些专业的影响叠加,进一步放大了信任赤字。委员会强调,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靠增加援助,还要从源头控制成本,并清晰展示教育成果。

其次是本科录取。报告认为这是公众关注度最高的部分。委员会指出,录取过程“不透明”是信任流失的关键。申请者及其家庭难以理解“谁被录取以及为何被录取”。报告具体批评了现行所谓“整体评估”的主观性,以及校友子女优先、运动员特招和捐赠者偏好等非学术因素的深度介入。这些做法虽有历史原因,但在平等主义时代却越来越被视为特权延续。报告引用内部数据和外部研究显示,这些因素显著影响了录取公平性的感知,并建议通过提高数据公开度,强化学术准备标准和重新审视申请材料来重建公信力。

再次是言论自由与自我审查。报告直指校园内普遍存在的“寒蝉效应”,即许多学生和年轻教职员都因担心社会或职业后果而避免表达异见。委员会重申,大学必须是“辩论与异见的开放论坛”。

当前的问题包括“取消文化”、行政干预和社交媒体放大效应,导致学术探究受限。报告认为,这种氛围不仅损害教育质量,也会进一步侵蚀公众信任。

与言论自由紧密相关的是政治与智力多元问题。报告指出耶鲁及其他精英校园存在严重的“回音室现象”,即特定观点主导课堂、讲座和研究议程,导致方法论和视角窄化。委员会强调,真正的学术卓越“依赖于方法论与观点的广度,而非某种政治正确的共识”。

这种同质化不仅削弱研究创新,也会让毕业生对多元社会准备不足。报告建议开展全校范围的自查,并通过邀请异见学者、改革课程设置和鼓励学生跨派别对话来纠正偏差。

我认为,报告中最具现实针对性的部分,是关于课堂与教育使命的讨论。委员会详细描述了数字技术对教学的侵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导致学生注意力碎片化、人际联结减少、孤独感上升,以及普遍的“分数通胀”现象——学生平均绩点持续上升,但实际学习深度下降。

报告强调,文科教育是“基础智慧”的核心价值,它依赖于持续的专注和面对面的深入互动。当前环境下,这些基础正在被侵蚀。委员会建议制定课堂规范,如限制电子设备使用,恢复严格评估标准,并将文科置于本科教育的核心位置,以帮助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和提升终身学习的能力。

最后是治理与资源。报告指出,过去20年来,耶鲁行政人员数量急剧膨胀,导致资源从教学研究一线转移,官僚程序繁琐,决策透明度不足。这些问题损害了内部信任,也让外部观察者质疑大学是否高效地使用了捐赠和学费。委员会分析了受托人、教职员和行政管理部门间的沟通断层,建议精简行政层级,优化资源分配,使其回归核心学术使命,并建立更加有效的共享治理机制,确保决策服务于长期教育目标,而非短期管理任务。

报告提出的20项推荐建议,正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这些建议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改革框架,其精神可以概括为“行动胜于宣言”。

如果前述问题构成了报告的现实诊断,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则是大学使命的演变。报告将大学使命的演变置于信任危机的核心成因中,在我看来,这也是它最具思想价值的地方。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最初使命极为具体明确——“培养学生从事教会和公民国家的公共事务”。300多年来,该校始终围绕“通过研究和教学去保存、创造和分享知识”这一大学本质来开展各项活动。这一表述见于《耶鲁教职员手册》。

2016年,在皮特·萨洛维担任校长时期,耶鲁有更为广泛的使命声明:“耶鲁致力于通过

杰出的研究、学术、教育、保存和实践,改善当今世界及未来世代,并教育那些能够服务全球社会各领域的有志向的领导者。”这一声明强调了“改善当今世界”,以及“有志向的领导者”,反映了全球化、社会正义和大学作为变革推动者的时代诉求。委员会承认这些目标“值得称道”,但指出“它们并非使大学成为大学的本质所在”。

我以为,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与前述“分散的目的”相一致的“蔓延的使命”变得漫无目的。大学一旦试图“对所有人都无所不能”,公众就难以对其进行评价。大学的使命越泛化,承诺越宏大,问责反而越困难,信任也就越容易流失。

因此,委员会建议耶鲁重申《耶鲁教职员手册》中的核心表述。对此,麦金尼斯迅速回应,强调必须肯定并清晰阐明耶鲁的学术目的是“保存、创造和分享知识”。

大学使命回归的意义

耶鲁随后更新了官网的使命声明,即聚焦知识的保存、创造和分享,删除了过去更广泛地改善世界的社会工程式表述。在我看来,在当前极度复杂的高等教育情势下,这一大学使命的回归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明确使命是信任的根本基石,而非可有可无的装饰。使命的无限扩展本意是提升大学的社会相关性,却容易作出“过度的承诺”。当大学声称要改善世界时,公众自然会以高昂学费、录取争议、校园极化等现实问题衡量其是否兑现了承诺。而当大学回到“保存、创造和分享知识”的核心时,它反而重新获得了可评判、可问责的基础。

其次,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大学放弃社会责任。恰恰相反,大学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往往不是直接介入每个现实议题,而是通过长期、自由、严肃的知识探索,为社会提供理解世界的能力。专注知识本身才是大学最大的社会贡献。

最后,耶鲁作为常春藤盟校的象征,其举措可能带动其他高校反思,推动整个高等教育从“解决一切问题”的想象中,转向重新确认自身独特的学术本分。在人工智能时代和注意力碎片化背景下,这一锚点尤为珍贵。大学若连持续思考、自由争论和深度学习空间都守不住,就很难证明自身仍有不可替代性。

当然,任何此类报告都有其局限性,这份报告也不例外。比如其中的20项推荐建议的落地高度依赖共享治理文化,可能面临缓慢推进的风险;一些批评者可能会认为改革的力度不够,例如未彻底取消校友子女优先录取等机制。

尽管如此,这份报告的最大价值仍在于其开启了一场必要的对话: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机并非不可逆转。只要大学愿意承担责任,回归本职,并以可见的制度、行动回应公众关切,信任仍有重建的可能。

耶鲁这份报告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罕见的平衡性。它既真实揭露高等教育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又保持改革主义的乐观精神;既承认大学在科学突破、人文洞见和社会流动方面的历史成就,又直面当代大学在成本、录取、言论自由等方面的盲点。这种不自辩、不推责的态度本就是重建信任的重要起点。

总之,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大学的危机不只是经费危机、治理危机或舆论危机,更是目的危机。大学如果不清楚自己为何而存在,社会也就不清楚为何要信任大学。因此,耶鲁的使命回归不是一次简单的措辞调整,而是一次面向未来制度的自我校正。

它提醒所有大学:在一个充满噪声、纷争与不确定性的时代,大学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承诺解决一切问题,而是守住知识、自由、专注与追求真理的空间。

近日,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国内头部高校均传出知名学者被质疑学术造假的新闻。其中,同济大学已于5月6日发布情况通报,确认其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某在《自然》期刊发表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某近期也因被实名举报论文数据涉嫌造假而引发公众关注,南开校方已宣布成立调查组启动调查程序。

近年来,虽然我国的科研诚信建设在制度规范、宣传教育、查处惩戒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有不少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被质疑,甚至已被证实学术不端。这些现象凸显了在科研诚信建设方面,国内高校仍然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面对科研诚信,多数高校依然“不温不火”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5年10月发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量、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以及被引用次数继续保持世界首位。同样在2025年,《自然》增刊《2025自然指数-科研城市》也显示,2024年全球十大科研城市中,中国城市首次占据榜单的半数以上席位,达到了6席。

这些数字无疑体现了近年来我国科技指标的突飞猛进。但与此同时,根据《自然》2025年2月发表的研究数据,2014年至2024年期间,我国学者参与的撤稿论文在撤稿论文总量中占比接近60%,数量超过2万篇。

一方面是科研以及论文数量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是居高不下的论文撤稿率,这种两极化表现让人深思。

事实上,我国在国家层面十分重视科研诚信的建设。特别是2018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几乎每一两年均会出台并推动落实与科研诚信相关的重要政策,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相比国家层面,国内各高校对科研诚信的重视程度却存在明显差异,其普遍表现可以用“不温不火”形容。

首先,面对科研不端可能导致的学生的被撤销学位、教师被开除等巨大风险,仍然有大量高校师生缺乏足够的警觉,对科研诚信的规范和要求一知半解,甚至漠不关心。

其次,面对因压力、侥幸、诱惑所致各种科研不端陷阱,高校师生的防范意识普遍淡薄,警惕性不高,由此也留下了很多隐患。

再次,面对社会各界对科研不端“零容忍”的普遍要求,高校针对此类事件的调查、处理、公示仍然遮遮掩掩,常被诟病,甚至导致高校公信力受损。

最后,面对人工智能(AI)对科研诚信的巨大冲击,很多高校师生对AI在科研中的使用规范知之甚少,甚至后知后觉。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广泛存在AI滥用、乱用等现象,其潜在的科研诚信风险不容小觑。

科研诚信建设远非“事务性工作”

众所周知,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石。这就决定了高校不应把科研诚信建设简单地看作一项管理师生的“事务性工作”,而必须站在助力我国实现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来认知。

基于此,高校应在以下一些方面重点发力。第一,高校不应被众多表现亮眼的科技指标所迷惑,而是要勇敢正视刺眼的撤稿数据,重视自身科研诚信建设的不足。

在这方面,高校应主动监测国际各大平台的撤稿数据,主动开展针对自身师生的科研不端调查,并从机构、人员、经费、制度、宣传教育、调查惩戒等角度,全方位地推进科研诚信建设,而不能将科研诚信建设做成“半拉子工程”。

此外,高校还需要严格按照要求,公布科研诚信建设年度报告,尤其要在报告中公开针对科研不端事件的查处情况,敢于暴露自身的短处。

第二,作为科研诚信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高校要高度重视面向广大师生开展的宣传教育工作。

当前,无论是为数众多的师生对科研不端风险的漠不关心,还是对科研不端陷阱预防意识的淡薄,都折射出高校科研诚信宣传教育的严重不足。高校不仅要关注当下,存在科研不端行为的少数群体,还应该将视角扩大,警惕潜在的科研不端出现。

因此,高校一方面要在官网设立“科研诚信”专栏,及时发布各政府机构和高校自身出台的相关政策和规范指引等;另一方面,高校也要把科研诚信纳入公共必修课程,并对所有老师进行科研诚信培训,让广大师生对科研诚信“知其意、明其险、懂其规、操其行”。

第三,高校必须摒弃“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加大科研不端惩戒力度、公开力度,强化科研不端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当前,我国高校几乎不公布本单位的科研不端案例,其调查与惩戒过程往往给人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感,这使得科研不端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大打折扣。

对此,高校要敢于对内部的科研不端事件下重手,正所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同时还要主动公开科研不端调查处理结果,充分发挥科研不端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第四,高校要跟进权威机构发布的AI使用规范指引,引导广大师生科学合理合规地使用AI。

当前,AI对科研诚信的冲击是剧烈的,造成的科研不端风险也是巨大的。高校需要及时跟进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权威机构发布的相关规范指引,引导广大师生明确AI在科研活动中的使用边界及注意事项,科学、合理、合规地使用AI,避免因误用或者滥用而导致科研不端事件的发生。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委员会委员)

科研诚信建设:高校须摒弃「家丑不可外扬」观念

■张红伟

中国大学评论

加大投入与均衡培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齐步走

■李锋亮

近期,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院直属高校陆续公布了2026年的经费预算。从经费规模来看,我国头部高校预算已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一流名校相当;同时,全国已有超过30所高校迈入年度预算“百亿俱乐部”。这是国家长期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自然结果。

回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211工程”到“985工程”,再到“双一流”建设,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同时我国一些头部高校多渠道筹措经费的能力也不断提升。在各类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中国高校的整体位次不断前移。在自然指数、高被引科学家数量等科研指标上,中国高校的表现亦令人瞩目。更重要的是,高水平大学在创新型人才培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持续而坚定的经费投入,就不会有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制造、空天科技等新兴领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高等教育仍需持续投入大量经费,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开展前沿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同时,我国高校经费中财政拨款占比较高,而科研成果转化、社会捐赠、教育基金会等多元筹资渠道尚未充分打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稳健增长。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差异极大,并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这使得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呈现“有高峰、少高原”的格局。然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绝非若干所头部高校经费达到国际顶尖水平就宣告完成。仅有少数头部高校经费充足,难以支撑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对大多数地方高校而言,它们承担着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任,但经费紧张仍是常态,面临师资流失、科研乏力等困境。这种巨大的经费落差,正在深刻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生态。经费充足的高校能够吸引顶尖师资、建设一流平台、招收优质生源,形成“投入—质量—声誉—更多投入”的良性循环;而经费匮乏的高校则更容易陷入“经费少—实力弱—吸引力小—经费更少”的恶性循环。

如果地方高校无法崛起,中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底座就难以牢固。这不仅关乎教育公平,也关乎国家创新体系安全。要建成真正的高等教育强国,我们不仅要巩固头部高校的“高峰”,更需支持更多地方高校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形成地方高校发展的“高原”,构建“头部引领、中间崛起、底座夯实”的全域高等教育发展体系。

因此,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在继续加大总体投入的同时,进一步支持更多地方高校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这既是补齐短板的迫切需要,也是挖掘潜力、释放活力的战略选择。

首先,优化资源配置结构,适度提升地方高校的经费占比。当前,中央财政对部属高校的投入已相当可观,但地方高校的经费主要依赖地方财政,而地方财政能力又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这种地区差异若不加以干预,将导致区域间高等教育差距进一步固化,并可能进一步形成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经济、科技、人口资源的虹吸效应。建议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专项基金等方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校的定向支持力度,逐步缩小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发达地区高校与欠发达地区高校之间的经费差距。

其次,完善分类评价体系,避免“一把尺子量所有”。当前高校评价中的不少指标对地方高校尤为不利,应建立健全分类评价、分类支持机制,针对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技术大学等不同类型高校建立差异化的评价标准和发展目标,让各类高校都能在各自赛道上追求卓越,而非挤在同一条“独木桥”上。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2026年部属高校预算数据的公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头部”的强劲实力,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信心。但与此同时,地方高校经费匮乏、区域差距悬殊的现实也提醒我们:真正的高等教育强国,不是若干所顶尖高校的“一枝独秀”,而是众多高水平大学的“百花齐放”;不是少数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高地”,而是覆盖全国、惠及全民的“高原”。

唯有继续加大投入,同时更加注重培育地方高校,让更多地方高校有机会、有能力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才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对国家战略的担当、对人民期待的回应。相信在持续投入的支撑下,我国将不断涌现出更多世界一流大学,建成结构合理、实力强劲、特色鲜明、公平包容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而真正建成引领世界、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高等教育强国。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聘教授)